

湘军史料丛刊

左宗棠 未刊书牘

任光亮 朱仲岳 整理

整 理 任光亮
朱仲岳
责任编辑 文正义
封面设计 许康铭

左宗棠未刊书牍

上海图书馆 上海博物馆藏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70,000 印张: 6.875 印数: 1—1,200

ISBN 7-80520-140-4

K·38

定价: 2.45元

〔湘岳 88-7-7〕

DAH 2/12

《湘军史料丛刊》序

湘军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居于首要的地位的。它之所以如此重要，并不在于与太平天国对抗，湘军陆军远非太平军敌手，曾国藩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致彭杏南》），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李秀成自述原稿》），非关湘军。而清皇朝的颓覆与民国军阀的形成，则由于湘军的兴起。故湘军的重要，首在政治，不是军事。

清中叶时，八旗已经衰朽，清代国家经制军队为绿营。绿营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全国兵权全握于兵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兵随将转，军队对国家的关系也跟着改变了。到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江南大营被打垮，绿营全部崩溃，清王朝不得不把对抗太平天国的全部责任交给曾国藩。于是湘军重要人物也都步步上升，有不少人做到总督、巡抚。

清代定制，置总督、巡抚，其下设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按劾与司法。两司听命于六部，均可专折奏事，其事权独立，不是督、抚所得而干预，部臣始有管辖的权力。督、抚对两司只居于监督的地位。所以督、抚的权力虽大，六部却可以用一纸文书控制他们。全国权力

全部集中于清中央。清代这种政局，一到湘军将帅爬上了督、抚舞台就改变了。他们首先把两司降为属官，接着不听部臣的命令。他们掌握了兵权、饷权，朝廷也莫可奈何，督、抚专政的局面于是形成。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需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康有为至说当时十八行省为“十八小国”（《康南海文集·裁行省议》）。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皇朝中央无力，遂移清祚。民国初，袁世凯盗国，再起革命；袁世凯死，又演成北洋军阀分崩割据的局面。早在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撰《湘军志》的王闿运经过湘乡城，目击“将富兵横”的情况，就已经预言“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知乱不久矣”（《湘绮楼日记》）。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上对政治的影响一至于此。

从兵制上说，清代咸丰前是绿营制度时代。咸丰末，湘军代替了绿营。曾国藩解散湘军，另编淮军，淮军的营制、饷章尽仿湘军。咸丰、同治军兴时，各省因绿营不可用，各募勇营以资战守，其制也都仿自湘军。故自咸、同以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编新式陆军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枢纽。

湘军士兵本是湘乡一带朴实的农民。做将领的靠他们卖命而升官发财，却还要克扣他们的月饷，吃他们的血。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是够惨了，如今当了兵，比在家做佃农还要惨。他们觉醒了，就加入反清的革命团体哥老会，在攻陷天京前，已经是“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曾文正公全集·批统带精毅营席皋司宝田禀军营纷纷哗噪诚为世变大忧未事之防管见所及数端缕陈案核由》）了。到攻陷天京，被解散回乡后，不到三年，就在湘乡造起反来。此后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到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时，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三千里联为一气，一处起义，处处响应。

二十年后，辛亥革命，哥老会就与同盟会共同推翻了清皇朝。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的巨魁，也是在政治、军事、思想多方面影响当时及后世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要研究近代史，不能不研究曾国藩，而他一生的事业主要表现于湘军，要了解他，解剖他，自然又非研究湘军不可。其它湘军重要人物，如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刘坤一等，也应该研究。

研究任何一项历史，都要求具备丰富的史料。湘军的史料在中国近代史的史料中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还是感到不够。

湘军至今已一百三十年，史料已经大量印行，是否还有未刊的呢？我认为有的。我于五十年代，在南京搜寻太平天国史料，从江苏省博物馆钞录有一部《曾国藩书牍》钞本，收信约六百三十通。一九六〇年，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把它编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总类第六部分“书牍”内。后来《汇编》因为字数太多，未能印刷。一九七七年，我再到南京重订《汇编》，为减少字数起见，把它抽了出来，未在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中出版。一九八五年四月，我接到岳麓书社文正义同志来信，说他到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去，看到这部书牍，问我经过。我查了我手边的《太平天国资料丛编总类目录》，才记起此事。我十分钦佩岳麓书社搜访史料工作的深入、细致，我赞成把这部《曾国藩书牍》印出来以供研究。在这里，我顺便说说有一本汪士铎著《胡文忠公抚鄂记》，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汪士铎是胡林翼、曾国藩座上客，参预密谋，专精地理学和史学。他这部记载，材料丰富，叙述扼要。我没有见过刊本，也未见人引据过，建议岳麓书社也把它印出来。可见在湖南以外的地区尚有一些重要的湘军史料未印，在湖南本地当会有更多的。

即使是刊行过的旧籍，现在也有整理重印的必要，象曾、胡、左这三个湘军主要人物的奏稿、批札、书信、日记、诗文集以至年谱、大事记、荣哀录，和一些次要人物的奏稿、批牍、函札等。（彭玉麟的《彭刚直诗稿》，俞樾论为可据以考彭玉麟的事迹。我考他的恋爱史，便是以这部诗稿为依据。见拙著《本证举例》，载《文史》第八辑。）此外，一些从军记、回忆录，如刘典《从戎识实》，陈湜《病榻述旧录》，也可重印。以上著作过去虽曾刊行过，现在大都买不到甚至难以找到了。记得广西贵县要研究黄鼎凤，叫我买部《刘坤一遗集》，我在北京遍找了七、八年都买不到。前年我撰有关太平天国嘉应州战役事，须查刘典《从戎识实》，竟到几间图书馆都借不到。我在北京还买不到、借不到，在比较小的地区更可知了。

岳麓书社编印《湘军史料丛刊》，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学术研究是一大贡献。我非常赞同，故乐为之序。

罗年纲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日谨序于北京

编者前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的研究也就离不开曾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的人物的研究。知人和论世相辅相成，不知人难以论世，不论世也无法知人。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都是把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同对历史人物的品评结合起来研究的，以求对于历史见木见林，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思维，也有明察秋毫的微观认识。

湘军在清中叶崛起之后，屡北屡战，终于取得了军事政治上的胜利，写下近代史上壮观而复杂的一页。清廷也不得不一改对满、汉奴才厚此薄彼的态度，八旗衰朽之后，只有依赖汉人来撑持摇摇欲坠的江山了。湘军对全国的影响尚不限于当时，并波及后世。它对湖南的作用力之大更是震古铄今，可以说，正是由于曾、左、彭、胡等人倡开风气，才造就了近百年来“唯楚有材”的鼎盛局面。所以罗尔纲先生说：“湘军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居于首要的地位的。”

湘军将领都是投笔从戎的读书人出身，戎马关山之中，文事与武功两不偏废。他们在留与后人以纓簪家世的同时，也遗下了众多的诗文、书牋、奏议……这些集子连同正史当然是研究他们的主要和重要历史文献。但是，正史的撰写与集子的编纂都带

有作者和编辑的政治偏见和主观色彩，并非完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因此，被遗逸、被刊落的文字——尤其是率意写成未加修饰的书牒，许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来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

本书收辑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书牒176通，除少数几通为《左文襄公全集》所收而文字略有不同（文字全同者已悉数剔除不录）外，其余都是未刊。试比较下面两段文字，即可见其价值之一斑。

从前金陵克复，幼逆逃去，弟曾致书曾文正，谓应据实陈明。文正不悟其意，翻疑弟之有意讥切，沅圃宫保亦以为非。弟此次报捷，疏首即揭出“首逆未获”四字，亦从前告文正之意耳。至南八城不满三月一律肃清，自周秦以来实亦罕见之鸿烈，故于诸将士之忠勤不敢稍为屈抑。（《左文襄公全集》卷二十《答谭文卿》）

从前金陵克复，幼逆逃去，弟曾致书曾文正，谓应据实陈明。文正不悟其意，翻疑弟之有意讥切，沅圃宫保亦以为非，此等私见颇非自命读书学道者所宜有。故弟此次报捷，疏首即揭出“首逆未获”四字，亦从前告文正之意耳。至新疆八城不满三月即一律肃清，自周秦以还未之或见，西域各国各种人之流寓经商在喀者无不诧为奇谈矣。既坏户而蛰，俄亦化鹰为鸠，足破洋枪队无敌之疑，令诸洞悉夷情以泰西自相恐弱者得以开拓心胸，增长知识，实亦罕见之鸿烈，故于诸将士之忠实勤劳不敢稍为屈抑。（本书127《致谭文卿》）

《左文襄公全集》的编者杨书霖诸人删去九十馀字，把左宗棠粉饰

成道貌岸然，失去了其固有的个性。未刊信就不是这样，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思想和情性都跃然纸上。

左宗棠同曾国藩的关系是近百年来一个热门话题，见之于多种稗官野史。左宗棠对曾国藩既时有如上信一般的微辞，也蕴蓄着热烈的故交情感。咸丰七年，他对曾氏不待朝命而奔丧回籍直言不讳地批评，从而招致不满。明年四月，左宗棠接到曾氏姗姗来迟的信后，复书云：

沅浦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待。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题欢惊，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失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慙恒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微也。来书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031《致曾国藩》）

刚愎的个性，诚恳的自责，火热的感情，一一纷呈笔底。研究曾，左关系史，如果只看到凶终隙末的一面，而不了解交谊深厚的一面，或者相反，都不可能获得符合历史的结论。

这批信札提供的史料之丰富，不仅一端而已。道光年间，左宗棠还在寄人篱下的时候，他和家人未能料及将会坐镇方面，对于往来书信不甚经意，所以《左文襄公全集》收这时的文字少而又少，《左文襄公年谱》对于这段历史也往往语焉不详。本书收录有道光年间左氏致友人书信多通，娓娓述说他在湘潭、在安化的生活琐故，填补了他早年经历里的某些空白。咸丰八年正月，他写给友人兼姻亲夏献云一信，道及多桩公案，扑朔迷离。尾署“退宜

轩”而不书名，并嘱“阅后丙之，勿貽笑柄”。这种颇不寻常的信札宜为杨书霖诸人所不取，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显得弥足珍贵。诸如此类的信札，本书里还在在多有。

我们如果仔细考证书中的史料，与某些第二手以至第三手材料印证，就可发现后者种种失误。比如《清史稿·疆臣年表八》载：陕西巡抚谭钟麟光绪五年五月戊子陛见，王思沂护。八月庚午迁浙江巡抚。据光绪五年六月左氏致谭钟麟书云：“得天赐日（按，指六月初六日）惠书，敬悉陛见已奉俞允，出月初吉即可首涂。”七月又致书云：“顷接廿四日缄，知已定七日交卸，廿日登程，约中秋前后可以召对，归期当在展重阳也。”以此证彼，《清史稿》所载就显有失实了。又如《清代职官年表·乡试职官年表》载：光绪五年甘肃乡试官，陈宝森（侍讲）；周开铭（江南道）。所附小传亦云：“陈宝森，光五，甘乡正考。”据左氏光绪五年与崇保书云：“伯潜、桂坞又皆文章巨手，凡所赏拔，必无凡材。”伯潜为陈宝琛字，桂坞乃周开铭字。又致陈宝琛书中亦云：“陇阄肇启，鹿鸣三奏，墨卷均可观。”证明是年甘肃乡试正考官乃是陈宝琛（王家相《清秘述闻录》卷八所载光绪五年甘肃乡试考官亦作“陈宝琛”）；陈宝森史无其人，乃是陈宝琛之误。又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载：“道光二十四年秋九月，自湘潭移家柳庄。”而左氏道光二十五年复胡林翼书谓“去腊移居”。九月非。

感谢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提供了他们的珍藏（凡属上海博物馆藏信札，书题上加有*符号，上海图书馆藏则不加），使读者得以了解百年前一些历史片断。为了考证各信的写作时间，我们适当地加了一点注脚。学识谫陋，疏误之处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龙年正月于长沙

目 录

致胡林翼(001~024).....	(1)
致周裕梓(025).....	(32)
致黎吉云(026).....	(33)
致□□□(027).....	(34)
致袁甲三(028).....	(35)
致曾国藩(029~040).....	(36)
致杨岳斌(041~044).....	(54)
致刘 典(045~053).....	(58)
致夏献云(054~070).....	(67)
致李鸿章(071).....	(85)
致史致谔(072).....	(86)
致叶介唐、林听孙(073).....	(87)
致曾国荃(074).....	(87)
致徐宗幹(075).....	(88)
致刘坤一(076).....	(89)
致谭廷襄(077~078).....	(90)
致冯誉骥(079~080).....	(91)
致郭松林(081).....	(93)

致沈应奎(082~102).....	(93)
致刘 琨(103).....	(116)
致□□□(104).....	(116)
致徐韦佩(105~108).....	(118)
致金 顺(109).....	(120)
致白恩佑(110).....	(121)
致谭鍾麟(111~143).....	(121)
致张 曜(144~150).....	(162)
致潘祖荫(151).....	(167)
致李鹤年(152).....	(168)
致胡光镛(153~154).....	(168)
致蒋凝学(155).....	(170)
致李云麟(156).....	(170)
致徐理卿(157~168).....	(171)
致崇 保(169~171).....	(181)
致陈宝琛(172~173).....	(184)
致刘锦棠(174~175).....	(185)
致阎敬铭(176).....	(188)

索引一 内容索引.....(1)

索引二 人名索引.....(5)

001 致胡林翼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

刘□持书之后，□日接奉吾咏之兄手简数番，深慰渴想。腊底清恙已全愈，甚堪欣慰。□□痛恐非仅外感所得，或肾气虚而有火故耶？尔我年齿方壮，而精气大□□人，弟自去腊移居后^①，因小事日日操劳，遂尔大形倦困。又复新留数茎之须，见者辄误以为四十餘人，此可想其惫矣。到馆后休养旬许，始渐有复元之望。壮不如人，何况于老，兹可叹也！大抵人生惟游房一事所损实多，而少食、多思其祸亦与之等，兼三者而有之，则无怪其惫也。既以自箴，还告阁下，幸留意焉。

去腊以来经营各事，皆系一手一足之烈。诸昆心事最可恃，而其才识之平庸殊非意料所及。即装修房舍一节，原以防盗贼为最要，如楼板、竹壁、地板及三合墙根乃系不可少者，自前年定局以后，即详细告知；去夏并绘图贴说，面遣奴子告知备细。比

^① 左宗棠《亡妻周夫人墓志铭》云：“道光二十三年，余举积年修脯，买田柳庄。明年移居湘上，此为有家之始。”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道光二十四年秋九月，自湘潭移家柳庄。”

入宅后点检一切，俱不中程，且有以省费而未及办理者。比入宅四夜，而偷儿入室，将女仆衣服席卷一空，幸弟警寤之速，随即追寻，尚不至大有所失，然三、四千青铜钱已抛却矣。自此告官议困，修屋安弩，诸事毕集，一家之人安眠不稳，殊可叹也。昨来时，匠役尚未尽行散遣，而病妻在床，仅恃一粗妾时为照理，苦况如何可言。书及此，梦魂已飞越数百里也。来札云能生一守分农夫，庶有以自老，此真大有阅历之语尔。我家若早有此，尚复何忧？然无子则欲其生，既生则又欲其可，人生心事总无足时。阁下求农夫而必取其守分者；此愿又何易副耶？一笑？

见阁下与玉轩书及初次书稿，词严义正，不禁狂呼称快。弟来时适玉轩已到，据云存银三千四百在敬村处，意欲捐纳知县（敬村捐知县，玉轩已将此项掷五百金与伊矣）。昨回家后，见家事大坏，不敢复作此想，此项仍当取回。弟当即责其起意之谬，并云：即此时趁早去取，或敬村已为尔上兑，将如之何？或敬村别有支销，又如之何？伊云：敬村断不致动，如已上兑，则我处只好以田业权抵，然想断无如此之速。弟答云：如原物全数归还，则尔之福；若有变动，则田业万不能抵，休错立主意也。然观其立言，或此项不至打散亦未可知。现与面商，专信足去金陵，属敬村即日付信行寄归，未知何如？此又非老夫子加一信与敬村不得也。事经痴人手，徒增缪轺，殊为可叹之至。兄处京项之数已属学子转禀卢姨无异。其因失金一节，费去之项岂亦须兄处认耶？此间捐输五千串，昨据安、益两令来信云，方伯札来，须易银上兑，此项议叙已议给老五，同知捐省分发，为数须四千数百两，在益阳办取，先尽帐目收之，帐目不够则巢谷，巢谷不够则卖田宅，田宅不够则出息借办。玉轩两次向说，意欲暂于金陵项下暂为通融，弟已严斥之，并明示以利害矣。大约此项收到，

金陵之项必须极力把持，或可勉强符前约。据愚见，三月初，弟或抽身到益阳，约会吾兄同赴长沙，请公局诸老眼同弹兑封识，齐送此间，交卢姨收管结实。丁属先期倡言，长沙（并内主前亦如此说。其实尔我不去长沙，公局亦未见吃紧）公局人必欲尔我一力耽承收领，始可交付，庶外间觊觎之心可死，而内主固藏之念始坚。且尔我之责成愈重，庶便一力把持，生死以之，不然恐犹无及也。现在事势实恐此项亦不能保固，此说实不得已为之，老兄卓见以为何如？此间诸事，亲戚不能持权，而内主亦殊不了事，惟此事重以公局，尔我始好尽平生气力，为此子一臂之助。此时想吾兄尚或可闻，果能如此，未必无益于事也。如老兄以为可行，即恳专丁赐示一音，以便先期诵言之。如何约伴之处，亦祈详示为荷。

去腊老五必欲得此议叙，而又恐弟之齟齬，使茂才微喻意旨。其时蒋老五捐官，向借内主，已无端应允。弟寻思无可解说，乃云：既老五要我与闻，我自与他去商之。比云：内主意以骨肉为重，议叙一说或无不可，但伊家原只拟以五千串上捐，而尔之议叙须四千馀金始可够上。见在光景你是明白的，如何能为设法？且我颇闻蒋五兄捐官要向此间借取四千馀串，两者并举，万万不能，且此端亦万万不可开！如你实要此议叙，则蒋处借项万不能应。如你说已经应诺，不便改口，祇说我一人从中作梗，我自有话向他分割。如你不能辞复蒋处，则议叙一说恐实在不能为尔办也。老五颇有渐愧之色，即云：蒋处不能答应亦怪不得，既卢姨辈有此好意，即尽此项办理可也。再三说之，尚无异词，能赖□蒋□□□□为值得，然尚不知究竟何如耳。刘八□去年底乘弟之归，在此借去谷四百石，今正又在此坐守，要此间受田据。玉轩云，内主又不免拖延也。如何如何。此间家事渐不能好，

将来恐受累无穷，此子真苦也。

与学子信及令岳母信已交去，王地师信并钱八千、研一方容即交梁元妥为料理。山兰非兰，乃蕙也，香气不减建兰。此地甚贱，十数钱便可得一盆，迟当多致之。家祖、祖母像赞想必附在印云处，而印云处信未见寄到，弟去腊未到伊处，想伊亦忘之矣。有便乞致信索归，恐日久则浮沉矣。

此间上下都平安，学子长甚速，体气日见结实，心中诸事了了，惟此差可喜耳。来使内主已给钱千二百文，并闻。此复，即恭请伯母大人福安，并颂尊嫂夫人闾福不宣。

愚弟宗棠顿复 十九夜

玉轩已于今日归家，伊此次诸事艰于措手，实为自寻烦恼，且恨之，且怜之。昨已将诸事过细丁属一番，不知能实力遵照否耳。

002 致胡林翼

(咸丰二年十月)

润芝仁兄观簪大人阁下：

前复去一棧尚未达览，顷专足来，复接手书，详悉一切。此间兵勇非不足用，副将、参、游以下未尝无人，逆贼已趋死地，而未能即行扑灭者，事权不一；又新值易帅之际，无所禀承，未免迁延观望，坐失事机也。爵帅自八月廿四梧州整节，一路濡滞，至十月初二始抵衡州，接钦差署督印^①，初十日抵湘潭，仍未见来省。其遣来之福军门（兴），初七日即抵湘潭，凡六日始抵河西之

① 咸丰二年九月，湖广总督程霨采革职，以两广总督徐广缙署。

平塘，距此尚二十餘里，既抵平塘又数日矣，尚未拔营前进，不解其故。河东河西兵勇已三万有奇，守城兵勇五千有奇，日费饷三万餘，半月以来率皆坐视。行间八总兵，同城两提军，新旧三中丞，彼此不相承摄。屡经中丞函致爵帅，乞其速临，又咨爵帅及福军门，将河西吃紧情形一一详陈，速其前进，总置不理，殊令人无从揣测，或者有一鸣惊人之日乎？

贼自攻扑省城以来，日有死伤，精锐亦销折及半。伪西王萧朝贵已被炮轰毙。此贼凶悍狡诈，为诸贼之冠，一经授首，其谋遂衰。若再能将伪东王杨秀清、伪翼王石达开剿毙，即可克日荡平矣。河西之贼约万餘，河东之贼约二万人，贼于河中搭造浮桥三道，往来互为声援，真长发不过数千，餘皆土匪。河西洋湖、稻湖晚稻最多，素称产谷之乡。贼之粮食尽资于此，日日令土匪抢掠搬运，盐硝透漏接济亦率由此，而我河西兵勇率多坐视。中丞遣弁带勇前去零剿，又谕令河西乡团陆续擒捕，颇有斩获。贼匪百计攻城，掘地道数路，深至二丈以外（廿九、初三两次轰城，我兵转祸为福，天也，亦人也）。我掘外壕御之（夫勇伤亡亦不少），破其三洞。现尚督飭加浚（此时贼尚掘挖不休，亦殊可虑），期于尽穿而止（然亦不能太深，恐城根空虚）。此皆苏翁不肯拆城外房屋（此人无谋而有市井之态，官绅俱恨而轻之），一念见好乡人所治之祸也。

贼于蔡公坟一带迤至河岸筑墙树栅，内外掘壕，遍栽竹签，防御甚固。房屋墙垣皆穴墙安炮，河街各马头皆用木石垒塞安设大炮。金盆岭下贼立五营，匪党约三、四千人驻守，以护浮桥而通河西之路，河西见家河贼连营数里，以逼接济而困我师，预为窜逸之地（见在却未曾窜出一人）。贼攻城不得，必并力西窜，由西而窜则宁、益当其冲，而常德危；由西而南窜则湘潭、湘乡当其冲，而衡、宝危；由西而北窜则常德、岳州两郡俱危。就大局